

湖湘

陈元吉 编

陈渠珍遗著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库

陈元吉 编

陈渠珍遗著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渠珍遗著 / 陈元吉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438-5493-2

I. 陈… II. 陈… III. 陈渠珍 (1882~1952) —文集
IV. Z4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73043号



湖湘文库(甲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陈渠珍遗著

著 者	陈元吉
责任编辑	彭富强
整体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营销部电话	0731-2226732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41.25
字 数	461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5493-2
定 价	124.00元

ISBN 978-7-5438-5493-2



9 787543 854932 >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 长	蒋建国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凌沙	姜儒振	吴志宪	李友志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金则恭	朱有志	刘献华
	钟志华	刘湘溶	彭国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李凌沙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曾鹏飞	毛良才	刘国瑛
	陈壮军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朱汉民	曾主陶	黄楚芳
委 员	李建国	丁双平	汪 华	刘清华	黄一九
	彭兆平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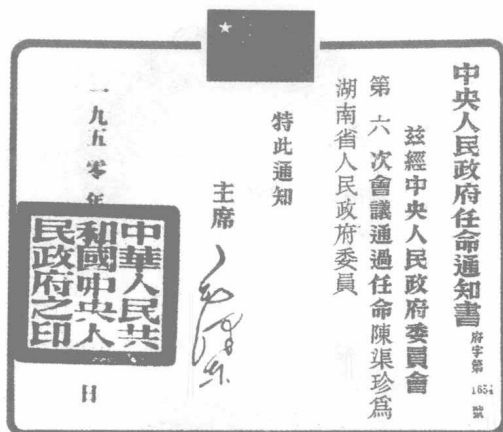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陈渠珍像





中共中央关于陈渠珍案的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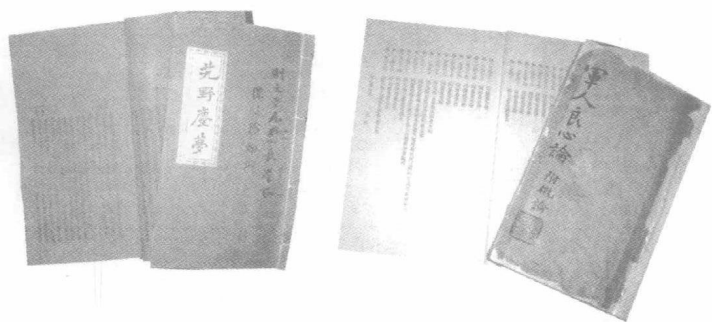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

中南局并湖南省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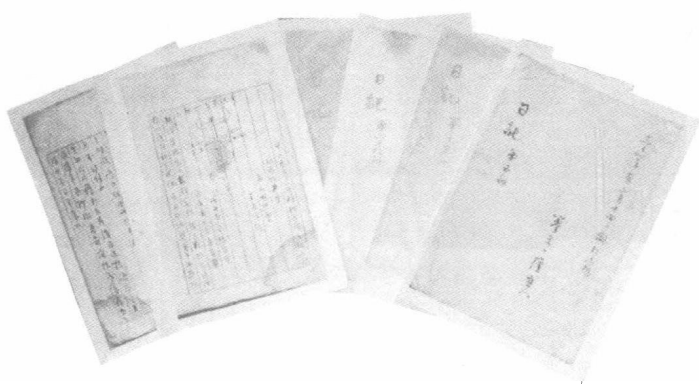
关于陈渠珍……。主席最近……。陈渠珍是湖南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

中央
一月五

(注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8年1月28日给湖南省委的函称：“我室在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陈渠珍案问题给湖南省委的指示，要求湖南省委对陈渠珍……，慎重处理。”以上系此函的附件摘录。注二，以上资料取自湖南省档案馆。)



陈渠珍专著



陈渠珍日记

前言

先父陈渠珍是1952年2月病故的，距今已是半个多世纪了。但往事并不如烟。特别是我近年来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先父的遗著和有关资料后，更加深了我对他的认识。先父生于湘西，长于湘西，热爱湘西，为此他多次离开湘西又回到湘西。在这离开与返回的过程中，闯过了无数惊涛骇浪，也经历了多次血与火的生死搏斗，备尝人间艰辛，几经绝境而获生。诚如先父在《芜野尘梦》自序中引用吴竟成先生说的“怪哉！此命打不死，杀不死，骂不死，穷不死，饿不死，跑不死，累不死，苦不死，气不死”。自己感叹说：“言不死者九……予命诚苦矣。”先父确是命运多舛，不仅在建国前多灾多难，即使1949年下半年举旗起义后，在1950年任省人民政府委员期间，还曾被人误解。幸得中共中央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英明决断，才免于灭顶之灾。因此，凡是比较了解先父坎坷生平与历经艰难险阻的，都称他是奇人奇才，奇情奇事，是“湘西怪杰”，赋予了很多传奇色彩。正因为如此，我在整理先父的遗著和有关资料时，也被他那坎坷生平中仍治学严谨、执著追求的独特个性和昔日的谆谆教诲所触动，心潮迭起，久久不能平静……

先父原名开琼，字玉璠，1882年9月出生于湘西凤凰县。7岁读私塾，14岁转读于本县名儒聂简堂学馆，16岁就读于芷江明山书院，17岁考取秀才。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后，清朝丧师赔款。特别是“庚子之变，外人盛倡瓜分之义”后，父亲“更痛心国

事”。此时“恰好省城有招考将弁学生的布告到县”，于是他投笔从戎，考进了湖南武备学堂（见《陈渠珍自传》）。学满两年毕业时，正逢湖南成立新军，他初任教官，继任队官。清督赵尔巽调川，便调先父同去，任川军65标队官。在英军侵犯西藏时，清廷令四川派一混成旅援藏，先父“深慕古人立功绝域之风，也想到藏有所建树，便参加入藏”，率部先后收复工布、山南、翠南，进攻波密，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时值辛亥革命风声传到西藏，藏军内讧，杀长官，拉队伍，组编新军，先父被拥戴为西藏革命军总指挥，而实权仍为帮会首领左右。先父迫不得已率领湘西新兵一连115人，经青海入甘肃，历时7个月，其间因绝粮迷道，几经绝地，损失惨重，回到西安时仅剩7人。先父同他的爱姬藏女西原彼此呵护，相伴始终。但不幸的是，西原在西安病逝，使先父悲痛难已，“肝肠碎断”（见《艮野尘梦》）。

先父辗转回家，正值湘西镇守使署成立，被任命为参谋长，后又升任为湘西剿匪总指挥，从此走上了治军理政的道路。先后担任过湘西巡防各军统领，十县剿匪总指挥，湘西镇守使，靖国联军军长，湖南第一区警备司令，湘西屯边使，北伐军左翼军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十九独立师师长，陆军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沅陵行署主任，湘西绥靖公署主任，新六军军长，中央军委中将高参，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副司令官，湖南省和平自救运动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49年11月举旗起义。解放后，1950年4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同年6月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参加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被选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先父早期参加同盟会，1950年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介绍加入民革，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

先父毕生喜爱读书，即使在戎马倥偬中，也仍未尝废离读书。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沈从文先生回忆说：“这统领官是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诩的军人，每个日子治学时间，似乎须同治事的时间相等。”（见《沈从文自传》）他一生崇尚孔、孟，尤好老、庄，潜心探求佛法，从而把儒、释、道三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修身、齐家、治军、理政中的指导思想。

以“仁”治军

先父致力于儒学孔子“仁”的研究颇深，对儒家经典提出了新观点。如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中庸》‘哀公问政’一章，大抵解释此章节者，只认定一‘诚’字，而不知其中心理论，实在一‘仁’字。故仁为体而诚为用。文武之政至‘凡事预则立’……故‘仁’字为此章之主眼，‘诚’字则为行化之功夫。”为此，他专著了《军人良心论》一书，全面论述了坚持以“仁”治军的必要和实践。他认为：“人类……都有同胎共母之关系，有骨肉手足之相亲。古人说‘乾父坤母’，又说‘民胞物与’，就是此意。所以相互扶助是人道的极致，也就是仁的全体大用。”所以他说军人的“良心以‘善’为体，以‘仁’为用……仁要利己利人，能利己利人是良心”。军人“不但要利己利人，还要进一步杀身成仁，才算是仁道的极致”。同时，先父在《军人良心论》中，进而界定了军人与土匪的区别。他说：“有良心的人拿枪是军人，没有良心的人拿枪便是土匪。因为军人存心是处处求人民利益，不顾自己牺牲的。土匪存心是处处求自己利益，不顾别人痛苦的。”（见《军人良心论》）他在乾城连以上军官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我军对于人民，宜亲之如家人，爱之如骨肉。”从而提出了

平时对地方的多项纪律：如对人民语言宜和平谦让；外出宜扶持老幼；借助民房勿妨碍其家政；驻扎公所勿得损坏；严禁拉夫；严禁擅入民房；禁止擅取民物；严禁调戏妇女；禁吸纸烟及饮酒；禁止诈骗民财及代人索债；禁止干涉词讼；禁止估当物品等等，即用铁的纪律保证落实以“仁”治军的各项措施（见《精神讲话》）。

先父在治军中，皈依“人主仁心”，遇事不为己利，更不去强求与钻营。军阀混战时期，不少人今天是上下级，心至金兰相处，明天就成为敌我，兵戎相见。先父看到这些现象，发出“叹人欲之横流，念兵祸之未已”的感叹。因此，他既未挥师逐鹿中原，又怕别地军阀来争夺他的地盘。于是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保境息民”的口号，只求“保护湘西一片干净土”。但是，事实与他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川军的破坏，黔军的蹂躏，何键、王家烈的阴谋夹击，他最终仍被何键、蒋介石以“通共、‘拥匪自重’罪名”勒令改编，解除兵权。

用“中”理政

先父认为儒家的千条万条，归纳起来就是一个“中”字。他在《答滕敬侯书》中说：“儒学之精髓，只一‘中’字，缘督以为经，随人性分增减之，近乎中，斯可矣。”并在《军人良心论》中论证说：“中是天命，即是至善之性。天得了中，便可以定位；地得了中，便可以育物；人得了中，便可以正性；物得了中，便可以全生。所以，就宇宙来说，中是天地之大本；就人事说，中是天下之达道。”还曾亲手抄摘儒家关于“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允执厥中”、“不偏则公，公则悦”等十多条中道的言论，作为座右铭。先父基于这一理论基础，将中道作为理政之

本，“既不欲卷入政争，又不忍漠视民命”（民国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督字第963号训令），致力“保境息民”。在1920—1925年担任湘西统领期间，匪患严重，尤以龙山、永顺、桑植、保靖四县为最。他便驻防保靖。他认为，对土匪的政策，也应用一个“中”的措施，即剿抚兼施，收编起义投诚的，招抚愿意改过自新的，打击最顽固的。不到一年就基本肃清了匪患。鉴于当时省政当局“一贯的是把湘西看成化外。因此，民智锢蔽，诸事落后”。（见《陈渠珍自传》）先父提倡乡自治，主持制定了《湘西十县联合乡自治全案》，大力推行乡自治。即：“划出一部分事业归各乡自己来办，照各乡的情形立定一种规则……重要的事，归官府代办，人民立于辅助的地位；人民能够自办的事，自己去办，官府立于监督的地位。”“为谋十县平民能认识日用文字”，“凡七岁至十三岁之男女，均须受初级小学教育。”先后颁发了《湘西十县教育施行计划大纲》、《湘西十县各乡推广小学单行条例》等法规。“一乡之事，大家同心努力”，把教育、实业、慈善、团务四种事办好。实现“老百姓都有饭吃，有衣穿，有家可住。上无官府苛待，下无土匪滋扰，事事皞皞，乐享太平之福”（见《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他锐意“致力于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全方位的改革和探索，开创了湘西工业文明，策划湘西向现代文明前进”（见《湘西统领陈渠珍·引言》）。不到两年，先后开办了联合中学、联合女校、保姆养成所、幼稚园、模范小学、乡村师范以及茶叶、棉业讲习所、乡政讲习所等，还办有军农、军工各一个大队。同时，对家庭困难的优秀学生，实行免交学费，使在校（所、班、队）学生（员）达4000人左右。曾使湘西出现了短暂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局面。但是，在军阀混战期间，他那不偏不倚、“允执厥中”的策略，肯定难以行通。因此，好景

不长，迅即被川军、黔军先后破坏。

后来，先父在任湘西屯边使、湘西行署主任等职务再次执政时，仍然坚持“允执厥中”的中道思路，以为保持中立，我不犯人，人一定不会犯我，能够实现“保境息民”的目的。于是，对上敷衍塞责，对内加强建设，通告各地：往来客商“有货被偷者，军队负责查清追还，如有追查不清，果为盗窃，由县政府照实赔偿不误，如有军警地棍对往来商贾勒索，除赔偿原物外，严加惩罚不贷”（见《凤凰光彩》杂志2008年第一期）。成立湘西13县农村建设委员会，推行农村自治。同时“先后聘请专家，在乾州开办实验农场，对农作物进行示范栽培；在泸溪县建立三湘农场，在保靖建立苗圃，发展农业和林业；在永顺城郊五里铺建立造纸厂，在乾州创办‘三一纺织厂’，在泸溪建立酒精厂，在桑植开办民营砂坝硫磺矿”；“还建成了湘川公路，疏浚了澧水航道，木帆船可由大庸直达桑植，州域各县相继建立邮电机机构，专县、县县之间实现通邮、通电话”（见湘西《自治州州志·概述》）。他本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暴政不满意，却又惧于其强大势力，不敢公开反对，只是明争暗斗，表面上还要服从统治当局的大政措施。因此，他被迫参与“剿共”，但同时又提出“剿共不剿贺”，还敢冒风险“阳奉阴违”，“通共”、“资共”，让共产党在湘西发展组织，合作抗日（见《湘西统领陈渠珍·引言》）。可是，在“恶浊社会，处到竞争剧烈的当里”，有权才有理，什么“中者天下之正道”，什么“建中于民”，什么“民协于中”，凡是不符合反动统治利益的，都不可能得到伸张。因此，先父皈依中道，妄想权势争夺中不左不右，保境息民，建设湘西的帜志，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最后，他自己有家不能住，被逼得离乡背井，只得远去四川南川埋头自办工厂（三一棉麻纺织厂），研究改进农业

机械。

治学严谨

先父认为，研究学问必须狠下工夫，应做到“五个宜”：（一）宜多读多记；（二）宜简练揣摩；（三）宜多手抄；（四）宜勤加注释；（五）宜深究小学训诂。又说：“欲致力古文，宜多读秦汉以上文字，再纵观唐宋诸家著作，以施其情；再进而选古文若干篇，逐字逐句详加注释。”（见《复滕敬侯书》）因此，先父坚持黎明即起，漱便后即读书写日记，或注释经传，或朗读经书，数十年如一日。从先父《读〈中庸〉“哀公问政”笔记》中可以看到，他对书中的每句话都有注释和感悟。如读到“人道敏政，地道敏树……”之句时，他则写道：“为政不得其人，犹树之不得培育，蒲芦之繁茂不得地宜也。非尽人皆可为政，必取其能修身而有仁德者。”在今天我读到这些文字时，都被他的严谨学风所震撼。先父最爱好的书籍是《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指定我几个哥哥要背诵《史记》的《项羽本纪》、《秦始皇本纪》、《屈原列传》和《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评语“臣光曰”等文章。他常教导我们要多读多记，要读至滚瓜烂熟，才能融会贯通；以后写文章，词汇才能丰富，思路才会敏捷，下笔如有神助。在他的《日记》中，还经常可以读到“为两儿讲书经”或“督两儿学《史鉴》”，“令熟读之”等话语。

先父除博览经、史外，尤其喜读《老子》、《庄子》，深受老庄哲学思想影响。我家建房，全系土木结构。他对亲友说：“我建房子，只管二十年，子弟有能力就维修，否则就让它倒塌。”其门额题为“寥天一庐”。此语出自《庄子》的“安排而去化，乃入寥天一庐”。堂屋及客厅两侧壁上均挂有庄子《养生》、《齐物》等